

王阳明与黄梨洲

●曹国庆

(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,江西南昌 330077)

摘要: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梨洲(宗羲),既是王(阳明)学的正宗传人,又对王学进行了修正,在阻止王学向禅宗、伪学深渊下滑之时,还汲取了朱子学说中的许多有益成份,进而将王学向自己诠释的而又不违反其自身逻辑的方向发展。

关键词: 王阳明;黄梨洲;文化传承

中图分类号: K 825.4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4-518X(2000)01-0052-05

在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上,王阳明与黄梨洲无疑占据重要地位。关于他们各自在文化思想史的贡献和影响,中外学术界已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不过,有关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和关系情况,则还讨论不多。王阳明生活在明代中叶,是一代心学宗师。明代中后期,阳明心学(亦称王学、新建之学、姚江之学)风靡天下,影响学术和世风至为深远,一些地方甚至有“家孔孟而人阳明”之誉,王学的地位和声势远在程朱理学之上。而黄梨洲不仅为明清之际一位杰出的民本思想大师,有东方卢梭之誉,还是阳明心学的集大成者,对王阳明在文化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确立和王门后学流弊的拯治,居功至伟,本文试就此略抒管见。

(一)

黄宗羲宗师于阳明心学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清人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浙东学术》中指出:“世推顾亭林(炎武)氏为开国儒宗,然自是浙西之学。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,呈与顾氏并峙,而上宗王、刘,下开二万,较之顾氏,源远流而流长矣。故顾氏宗朱,而黄氏宗陆。”^①章学诚清楚地看到了从陆九渊、王阳明到刘宗周、黄梨洲间连绵相续的学脉。然而,黄梨洲何以要选择王学,人们似乎谈论不多。

首先,当是由于戴山门人的关系,为继承业师学术衣钵,而一脉相承下来的原故。在王阳明和黄梨洲

之间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,这便是刘宗周。刘宗周字起东,号念台,晚年更号克念子,学者称蕺山先生,浙东山阴(今属绍兴市)人,是一位著名的学者,同时也是东林党的主要成员之一。

按说,刘宗周并非出自王门,更不是王门嫡传。他幼为孤童,始从外祖章颖发蒙习儒,长大后亲受业于谿若水(甘泉)再传弟子许孚远门下。谿、王学术之争,天下学子无不知晓,“阳明宗旨致良知,先生(甘泉)处体认天理,学者遂以良知之学,各立门户”。平时相互间鲜有往来,各自门户之见都甚深,如王门嫡传邹守益曾戒其同门:“甘泉先生来,吾辈当献老而不乞言,毋有所轻论辨也。”^②其门户间的关系由此可见。但是,刘宗周不是一个墨守师说不敢逾矩尺半步的人,博于阅览、精于思考的治学风格,使他“于新建之学,凡三变:始而疑、中而信、终而辨难,不遗余力。”^③据其子刘灼在《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》中记载,刘宗周早年“不喜象山、阳明之学”,至三十七岁时,著《心论》提出:“天下只此一心,散为万化,万化复归一心”,表明他开始转向陆王心学。四十七岁,正式提出“慎独”学说,“读阳明文集,始信之不疑”。四十八岁,纳黄梨洲于门下。因而,黄梨洲的学术思想的起点是王学,当他投入刘宗周门下时,刘宗周已从甘泉学说中游离出来,并且高举王学大旗,对王学末流由良知而入禅的言论痛加针砭,成为王学的忠实捍

卫者和积极传播者。刘宗周向黄梨洲传授的不是许孚远的学说,而是他自己潜心钻研王学的心得,是王学的一些重要的学说。

再者,王阳明出身于浙江余姚,是黄梨洲的乡里前贤,使其自幼受到流风遗泽的熏陶。明朝末年,各处王学渐衰,唯独他家乡浙东的流风余韵,还传衍得很长。作为王学的发源地,“姚江之教,自近而远,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耳”,及王学大行其道,流布天下之时,浙江与江右并为王学的两大重镇,其同府著籍弟子中,著名的就有徐爱、钱德洪、王畿等人。徐爱为阳明的内兄弟,也是最早的及门弟子,“学者在疑信之间,先生为之骑邮以通彼我”,可称是王门的颜渊。④钱德洪在王阳明平定宸濠叛乱返乡里之后,与同邑范引年、管州、郑寅、柴凤、徐珊、吴仁等数十人,“会于中天阁,同禀学焉”。当时,“四方之士,来学于越者甚众,先生与龙溪疏通其大旨,而后卒业于文成”,所以,钱德洪与山阴王畿又共同获得了王门教授师的称誉。⑤徐爱、钱德洪、王畿门下又有一批自己的弟子,尤以王畿门下弟子声势最大,于此对黄梨洲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,趋使着勤学善思的他,去深入了解乡里前贤大儒的学说,并立志要把它发扬光大。

明清之际,浙东王学渐趋歧途,许多王门后学由于未得师门原旨,随意阐发,使其学说或流于禅、或流于俗、或流于伪。“当是时,浙河东之学,新建一传而为王龙溪谿,再传而为周海门汝登、陶文简,则湛然澄之,禅入之。三传而为陶石梁弼龄,辅之以姚江之沈国模、管宗圣、史孝咸,而密云悟之,禅又入。会稽诸生王朝式者,又以裨阖之术,鼓动以行其教。证人之会,石梁与先生分席而讲,而又为会于白马山,杂以因果、僻经、妄说,而新建之传扫地矣。”⑥从刘宗周到黄梨洲,师徒二人遂不遗余力地担负起拯救王学的重任,并且把明代学脉正统的位置给了王学,充分肯定王阳明一代学术宗师的地位。

(二)

因于以王学为宗,兼又对中国学术史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和研究,黄梨洲对王学的地位推崇有加。在他看来,有明一代的学术,由白沙(陈献章)开其端,至姚江(王阳明)始大明,元末明初的一些经生学人,虽习熟了几句先儒的陈说,却未尝反身理会,推见至隐,这无异于“童子之述朱,画家之临贴,天下汨没于支离章句之中”。⑦

康熙十五年(1676年),黄梨洲《明儒学案》完成,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学术史,同时也是一种体

例创新、立论精当的全新的史学著述。基于“大凡学有宗旨,是其人之得力处,亦是学者之入门处”的认识。他将明一代二百一十四名学者区分宗旨,归入相关学案。分类的原则是:“以有所授受者,分为各案。其特起者,后之学者,不甚著者,总列诸儒之案”。从实际情况来看,全书计设崇仁、白沙、河东、三原、姚江、王门(又分浙中、江右、南中、楚中、北方、闽越)、止修、泰州、甘泉、诸儒(分上、中、下)、东林、戴山等19个学案,显然这是一个以王学为明代学术主流的分类法。在《明儒学案》中,他写道:“高忠宪(攀龙)云‘薛敬轩()、吕泾野(楠)语录中,皆无甚透悟’,亦为是也,自姚江指点出‘良知人人现在,一反观而自得’,则人人有作圣之路,如马医夏畦皆可反身认取,步趋唯诺,无非太和真觉”,又说“孟子曰‘人皆可以为尧舜’,后之儒者,唯其难视圣人,或求之静座澄心,或求之格物穷理,或求之人生以上……至谓千五百年之间,天地亦是架漏过时,人心亦是牵补度日,是人皆不可为尧舜矣,非阳明亦孰雪此冤哉!”最后的结论是,“故无姚江,则古来之学脉绝也”。如此以来,不仅给了王学一个正统地位,肯定王学取代朱学而成为学术主导,而且还给了王学一个拯救古来学术的美誉,这是王门亲传、再传、三传、四传弟子中,无人能说出来、无人能做到的。清人莫晋指出:“要其微意,实以大宗属姚江,而以崇仁为启明,戴山为后劲。凡宗姚江与辟姚江者,是非互见,得失两存,所以阐良知之秘,而防其流弊,用意致深远也。”⑧

由于王阳明“致良知”一语发自晚年,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,后来的一些门下弟子各以意见掺和,谈玄说妙,几同射覆,“非复立言之本意”。⑨黄梨洲为王门救偏治弊的努力,便是从王学的原旨入手,由对致良知的阐释而生发开来。他的一个重要的创见,就是指出“致良知于事事物物,致字即是行字,以救空空穷理,在‘知’上讨个分晓之非,乃后之学者,测度想像,求见本体,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,则阳明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,而必欲自为一说耶”?这无疑是大儒的手笔,从病根处下药。对广为流传、影响久远而最为后人争议的王门“四句教”——“无善无恶之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”,他则质疑它的真实性,认为这四句话的内涵自相矛盾,称“先生每言,至善是心之本体。又曰‘至善只是近乎天理之极,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,又曰‘良知既天理’……有时说‘无善无恶者理之静’,亦未尝径说‘无善无恶是心体’,若心体果是无善恶,则

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?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,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?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!”^⑩他进而推断,这可能是由王畿增益而成,未必出自阳明之口,“斯言也,于阳明乎日之言无可考见,独先生(王畿)言之耳”,^⑪潜意思即指四句教是龙溪之学,而非阳明之学,学者以“无善无恶一言排摘阳明,岂知与阳明绝无干预,故学阳明者与议阳明者,均失阳明立言之旨”,^⑫真是茧丝牛毛,莫大的悲哀。在《姚江学案中》,他自负地指出:“得羲说而存之,而后知先生之无弊也”,将王学正宗传人的帽子当仁不让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。

黄梨洲在充当王学正宗传人的同时,又扮演着王学修正者的角色。黄梨洲对王学的认识,主要来自其业师刘宗周,而刘宗周对王学自开始便是持一种审慎的态度,由疑而入信。黄梨洲曾谈到,“先生以谓新建之流弊,亦即新建之择焉而不精,语焉而不详,有以启之也”。也就是说,因于门生不得人、说理不透彻之故,这对黄梨洲有很大的启发,要治弊去根,就必须择而精,语而详,王门择而不精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。语焉而不详,从某种意义上说,则是微言大义的精妙所在,也为自己拯救和发展留下了一个极大的诠释空间。

黄梨洲对王学的另一贡献,就在于他在阻止王学向禅宗、伪学深渊进一步下滑的同时,又将王学向自己诠释的而又不违反其自身逻辑的方向引伸。因而,在学术发展史上,黄梨洲与乃师刘宗周之学可以视作王学的余绪和新芽,但毕竟又不是王学的原生物,只是修正的结果。黄梨洲说“先师意为心之所存,与阳明良知是未发之中,其宗旨正相应合也”,若“欲全阳明宗旨,非先师之言意不可”,^⑬这是谈其业师对王学的修正。又说“所疑(于阳明)者,大端有二:谓致知之说局于方寸,学问思辨之功一切弃却。夫阳明之所以致知者,由学问思辨以致之,其万死一生,皆学问思辨也”,则便是谈其自己对王学的修正,“致良知于事物”是王学原旨,“致知即是行”^⑭是黄氏研究王学的心得。近人梁启超指出,明清之际的学者,对王学作过三次修正,第一次是顾宪成、高攀龙,第二次是刘宗周,第三次便是黄梨洲、孙夏峰、李二曲,尤以黄梨洲所作的修正最大。^⑮这是很有见地的。

黄梨洲还是辨析王门诸子宗旨、评判各自得失短长的裁判员。他以学案的形式将明儒分为十七个门派,又以王学为明代学术的主流,分浙中、江右、南中、楚中、北方、闽粤六支,原来出自王门的王艮(心

斋)、李材(见罗)等被别设泰州、止修学案处之,并且把王学的正统地位给了江右,提出“姚江之学,唯江右得其传,东廓、念庵、两峰、双江其选也,再传而为塘南、思墨,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,是时越中流弊错出,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,而江右独能破之,阳明之道赖以不坠,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,亦其感应之理,宜也”。^⑯本来,王龙溪(畿)、钱绪山(德洪)、王心斋(艮)都是亲炙阳明的,也是阳明相当看重的弟子,非只是一般的登堂入室,甚至可称为左膀右臂,但是在他看来,由于他们“习闻其过重之言”,未得师说真谛,致使王学未流入禅、入伪、入俗,实难辞其咎,他们理解的“良知”,“俱以见在知觉而言,于圣贤凝聚处,尽于扫除”。^⑰于师门原旨表面上是差之毫厘,实则是谬以千里。由于评判的标准是他自定,聂双江(豹)的“归寂”、邹东廓(守益)的“戒惧”、罗念庵(洪先)的“主静”,俱暗和于他的“良知是未发之中”的诠释,似不免有因旨趣相近而偏袒江右王门之嫌,但他开诚布公、引经据典、持之有故,便也赢得了后世的首肯,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极高的权威性。

(三)

作为一名王学的传入,黄梨洲对朱学的基本认识,主要接受的是王阳明《朱子晚年定论》中的诠释,认为“考亭之悟,毕竟在晚年,阳明子为《朱子晚年定论》,虽有或出于早年者,其大意灼然不失也。”^⑱但是,他也毕竟是一个学养深厚、心胸开阔的人,他对朱学的尊崇,也是许多其他的王门后学所不及的。在他的著述中,尊朱言论随处可见。如在康熙七年(1668年)撰写的《恽仲升文集序》中,他就自称“吾心之所是,证之朱子而合也,证之数百年来之儒者,而亦合也”,这无异是说,以朱子所是是为是,以合于朱子为荣。对世人指斥科举考试制度规定以朱子之言为标准,扼杀士人的独立思考问题,他认为那并非朱子的本意,因为“将朱子之书一一读之乎,夫朱子之教,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。”^⑲后儒为求取功名,皓首穷经,唯朱子之言而死记硬背,亦步亦趋,这是后世统治者所制定的制度方面的问题,而非朱子本人之过。

在拯救王学向禅宗深渊下滑,批驳王门后学“援释入儒”之时,黄梨洲在朱学宝库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成份。宋明儒学的发展,一方面是受佛学刺激而生,但在另一方面,又不能不在儒佛之间严加分疏,否则将会导致“弥近理而大乱真也”。与王学相比,朱子的最大优势是远禅。朱子不但指禅为告子,对悬空

想象的本体加以排击,以其为近禅,同时对禅家“作用是性”等命题也予以辨难,黄梨洲所提出的“工夫所至,即其本体”的思想,不仅避免了悬空只说一个本体,还指出若不肯踏实作功夫,便不免流于禅,当不无受此启发。黄梨洲对朱子的穷理说进行过改造,认为“穷理者,穷此心之万殊,非究万物之万殊也”。同时又说,“若不见理一,则茫然不知何者为殊,殊亦殊个甚么,为学次第,鲜有不紊乱者,切莫将朱子之言错会”。¹⁹显然,这也只有对朱子著述一一阅读,并有自得者才能说得这番话。在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的具体设想中,他甚至明言是“仿朱子议”,以朱子的《学校贡举私议》为蓝本来展开。当然,必须指出的是,他的宗陆而不悖于朱的治学态度,与历史上那些刻意调停朱陆关系的人是完全不同的,前者往往带有较多的主观随意性,为调停而调停,在学理上不免失之牵强而难以服人;后者则是从陆学出发,在朱陆之间寻求相通的东西,在朱学里获取学术营养,这是他较之历史上的调停派要高明的地方。

对那些不学无术而又性喜意气用事,以朱子攻陆王的腐儒,他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。在晚年著成的《破邪论》一书中,专设《骂先贤》一文,文中就传闻一书生因骂李贽而梦见李贽前来质问惊吓成病事,发表议论,称“于是为今之骂象山、阳明者大惧焉,卓吾生平喜骂人,且其学术偏僻,骂之未始不可,而聊尔人尚不可骂,况象山、阳明之为先贤者乎!”他还说“今之敢于骂象山、阳明者,以晦翁为之主耳,此如豪奴之慢宾客,疯犬之逐行人,其主未尝知也”。²¹由此可见,他并不反对学术上的分歧,痛恨的是不讲道理的随意攻讦。

当然,在他的心目中,陆王心学的正统地位是任何一种学说都无法替代的,即便是程朱理学也不行。他编纂《明儒学案》,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目的,就是要以儒学统帅理学、道学,并确立陆王心学在儒学中的主导地位。在获悉明史馆内有人主张另立《理学传》时,他给史馆总裁上了一道《移史馆不宜另立〈理学传〉书》,针对《修史条约》有关理学四款所存在的问题,逐一加以批驳,指出“以程朱一派为正统”于史不符,把薛、曹端、罗钦顺、魏校、顾宪成、高攀龙等人列入《理学传》中,“何以见其嫡骨也”?强调“道学一门所当去也,一切总归儒林,则学术之异同,皆可无论,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”。说服史馆放弃了原先要设立《理学传》的打算。为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达自己的这种思想,让天下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

自己的主张,使《明儒学案》的内容更加有针对性,在《明儒学案》中,他不仅推崇陆王,而且将以往被误列为程朱派下的罗钦顺、魏校、张元贞等诸儒一一甄别出来,指出罗钦顺主张“通天地,亘古今,无非一气而已”,其“论理气,专攻朱子理气乃其主脑,则非其派下明矣”!称魏校原来私淑于胡居仁,疑陆象山为禅,但晚年转变观点,提出“象山天资高,论学甚正,凡所指示,坦然如由大道而行”,“则于师门之教又一转矣。”又称张元贞的学说,“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,即阳明心即理也。其言斯道在天地,不患践之弗力,所患知之弗真,即阳明知行合一也。已先发明阳明之蕴也”。因而《明儒学案》自始至终都是以阳明、蕺山为宗,贯穿一条心学主线。观此书,不仅对有明一代学术源流自可了如指掌,于“上下诸先生,深浅各得,醇疵互见”。²²而且,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于王学的推崇之高和贡献之巨。

注:

- ①章学诚著、叶瑛校注《文史通义校注》卷5,《浙东学术》,页523,北京,中华书局,1985年。②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卷37,《文简湛甘泉先生若水》,页876,杭州,浙江古籍出版社,1985年。③《黄宗羲全集》卷1,《子刘子学言》,页254。④《明儒学案》卷11,《郇中徐横山先生爱》,页221。⑤《明儒学案》卷11,《员外钱绪山先生德洪》,页225;页226。⑥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册,《子刘子行状》,页253。⑦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0册,《余江县重修儒学记》,页127。⑧《明儒学案》上册,《莫晋序》,页15。⑨⑩⑭《明儒学案》卷10,《姚江学案》,页179;页218;页179。⑪《明儒学案》卷12,《郇中王龙溪先生畿》,页238。⑫《明儒学案》卷36,《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》,页855。⑬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0册,《答董吴仲论学书》,页143。⑭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》,页40,上海,复旦大学出版社,1985年。⑮《明儒学案》卷18,《江右王门学案》,页333。⑯黄宗羲《宋元学案》卷48,《晦翁学案》,页889,北京,中华书局,1986年。⑰黄宗羲著、陈乃乾编《黄梨洲文集》第1册,页334,北京,中华书局,1985年。⑱《宋元学案》卷39,《豫章学案》,页593。⑲《昭代丛书》己集卷15,《破邪论》,页18。⑳《明儒学案》上册,《黄梨洲先生原序》,页10。

(责任编辑:晨虹)